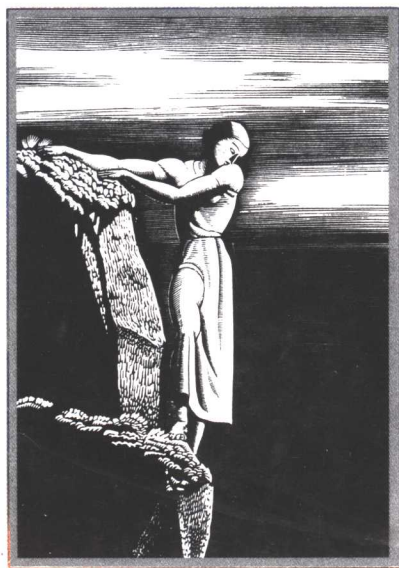


思想者杂语

野 菊 二 集



邢小群 著

凝望夕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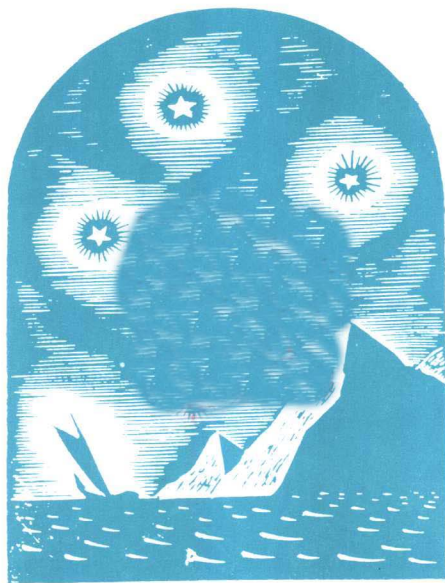
青 岛 出 版 社

凝望夕陽

邢小群 著

思想者杂语

青 岛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 08 号

策 划 丁 东

责任编辑 王一方 杨敏青

装帧设计 郝 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望夕阳/邢小群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1

(野菊二集·思想者杂语)

ISBN 7-5436-1955-5

I. 凝… II. 邢…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331 号

野 菊 二 集

凝 望 夕 阳

邢小群 著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 政 编 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排版

胶 州 市 装 潢 印 刷 厂 印 刷

*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9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7-5436-1955-5/I·320

定价:14.00 元

野菊二集

守夜者札记

林贤治著

青山遮不住

蓝英年著

带伤的黎明

崔卫平著

西窗东眺

程映虹著

凝望夕阳

邢小群著

南窗寄傲

马斗全著

野菊

邢小群·凝望夕阳·自序

自序

书里书外

1993年，我告别了身为知青在外地的长长羁旅，回到了北京，在一家经济类杂志供职。我在这本杂志上搞的经济学家专访，被湖北的《今日名流》杂志注意，他们希望我在京城给他们采访名流人物，并且开始每期给我寄杂志。白看人家的杂志，渐生愧意，心想，多少总该写一点。但自己不是追星族，对影视、体育明星等大众偶像并无兴趣，写什么好呢？想来想去，我认识的唐达成先生，应当算是文化名流。《今日名流》杂志又是湖北作协主办，大概这个选题他们可以认同。

和唐达成先生认识较早。70年代，我在山西大学念书时，曾到太原钢铁厂实习，在太钢一处低矮的小房子里拜访过他。那时他还负着1957年的十字架，走着背运。80年代中，他走上中国文学界的领导岗位，在后来的风风雨雨中，因为坚守人格底线，提前退了位。他脱了乌纱帽，交谈起来就比较放松。但我当时脑子里只想着如何交待《今日名流》，又不知他们水深水浅，现在看来，这一篇思想不够解放，写得比较肤泛。其实，唐先生说自己一直充当的“觉新”角色，就有很多内容可挖掘。他不但是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见证人，还是50年代文坛风雨的见证人。去年他动了手术，目前正在家中调养。我真希望唐先生能把这些重要的史实形成文字，为中

野菊

邢小群·凝望夕阳·自序

国的文学史，也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留下历史的见证。

写完唐先生，杂志尚满意，让继续写。再找谁？又想到了邵燕祥先生。80年代中，我曾在《诗刊》短期帮忙，与邵先生有过点头之交。我之所以想写他，与其说是因为这一点因缘，不如说是读了他近些年的言论。为了了解他，我又读了他的长篇回忆《沉船》（后来收入“火凤凰文库”），思想上受到震动。他不但对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批判，对中国的历史有深刻的反省，对自己灵魂的历程也进行了认真而透彻的拷问。在我采访他之后，他又将自己“文革”期间的检查交代以及相关文字编成《人生败笔》一书出版。邵先生在惠赠我的书上题着：“一个‘标本’供解剖。”我想，邵先生这种自我解剖的思想意义，绝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升华，同时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告别20世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范例和人格范例。

写过邵燕祥之后，我发现无意中采访的两个人，1957有共同的遭遇。在反右派斗争中，陷于深渊的知识分子有几十万人，他们是怎样一些人？当时有什么具体的遭遇？改正以后又做了些什么？今天还在思考什么？能不能沿着这个思路采访下去呢？我正好读了意大利女记者奥列娜·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录》，法拉奇是以她独特的采访风格实现着她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我能不能也尝试一下，搞一个口述史系列呢？

有了这个想法，方又觉得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采访的对象本身就是作家学者，都是大手笔，他们的要求当然是很苛刻的。为采访一个人，往往还要先把他们数百万字的书读一遍，写成初稿再请他们核实，反复推敲。这样，每写一篇，往往要占用几个月的时间。

当然，采访过程中有些事回想起来，也挺有意味。

温济泽先生在和我谈到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时，谈到了周扬。

野菊

邢小群·凝望夕阳·自序

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他的上级。温老描述了1957年周扬见到他时的骄横态度。仅仅因为他对周扬的一次讲话提出了不同意见,就成了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一条罪状。我觉得这一段内容,在有关周扬的研究材料中未曾见过,就写进了访谈录中。但是,温老阅审时,将这一部分内容毫不含糊地删去了。周扬这个人,作为中国当代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确实给研究者出了一道难题。我以为究其难,还不全在于会牵扯到他背后的巨大阴影,其中也有善良的人们基于对周扬晚年的肯定,不知将其以前的形象应该给予怎样的判断。也许我和温老不是一代人,我内心总是有一种还原历史真实的冲动,而不愿仅仅局限于当下的价值判断。

曾彦修先生我访问了两次,前后长达十几个小时。初稿出来,也被老先生删去了很多。因为涉及到现在还活着的人。我只能尊重他的意见,换个角度写了一些他的经历。后来,《百年潮》杂志知道我手里还有一份曾彦修自述,想刊用,我再次征求曾老的意见,他仍然不同意发表,竟还给我寄来一千元钱,说是让你辛苦写了那么多,费时费力,不能发表,聊补欠意,用作买书吧。真让我哭笑不得,又得寄还给他。

听说李慎之先生有“三不”:不给媒体开专栏,不接受采访,不接受约稿。我是在其坚守“三不”时,请他破例的,可想其难。写好后,他说:谢谢你,留作我日后写自传参考吧。后来他也确实给《百年潮》写了一篇《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我看后有所体会:以李先生对文意分寸的把握,对字句的讲究,他当然更信任自己的手笔。但是 he 也许未曾想到,交谈中的激情、自信和自然,会较多地留在访谈中,比起他自己斟酌过的文字,别有一种味道。大约两年后,他才勉强同意发表我给他整理的自述,并说,清样我不看了,否则我会改变主意。这反而让我对这篇稿子小心了再小心,

因为它是被采访者唯一没有审订过的稿子。

有的采访写出后不能发表,是由于稿子以外的原因。比如写朱正先生,就不能不谈到他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他这本书的手稿我看了,我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反右斗争最有分量的著作。但是,我采访朱先生的时候,这本书稿在出版社和有关领导部门之间转来转去,就是拿不到通行证。尽管朱正说过:“我写书,只想得到两张通行证,一张是现在能通得过;一张是将来能通得过。”但他还是对形势估计乐观,总觉得这本在当时被视为将来能通过的书,也许能侥幸过关。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有一请求:在那本书出版以前不要发表此文,以免引起注意,增加阻力。当我知道确实开印了,当立即奉告,倘若大文和拙稿同时闻世,倒是好事。”为此我的采访文章又放了很久。后来,《中华儿女》索稿,征得他同意,只好把谈到这本书的一节删去发表。写戴煌的文章,一时发表不出来,竟也是与他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有关。而这些有力度的作品正是表现著作者思想、人格最好的依据。最近这两部大作终于面世,它们已成为1998年的中国出版界最有分量的收获。

在采访的人中,唯独冯亦代先生不愿谈反右时的那段经历。他谈话的兴奋点,在他的翻译生涯和写作方面。过去他为左翼文化运动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情况是出于对一种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对朋友的友情。我感到他生性就不喜欢政治,对自己不得已掉进的政治旋涡,有一种厌恶心理,似乎是不屑一谈。我尊重他的意愿。谁知,他今年病了一场,对人说,最大的遗憾是有一篇文章没写,题目就是《从反右到文革》。现在他想写,却力不从心了。

给章乃器当过秘书的许汉三先生曾与我家是邻居,现在住得也不远。他已经90高龄,仍每日读书不辍。时下思想界关注的书

野菊

邢小群·凝望夕阳·自序

他都看过,如《陈寅恪的最后20年》、《心香泪酒祭吴宓》等。我知道许老本人也是右派,坎坷多桀。但他不让我写他,他说,要写就写章乃器,写章先生,也就了解了他。他头脑非常清楚,比如他说:“章乃器的悲剧就在于他和一部分人(民建会的)的矛盾当中,夹杂着与执政党的矛盾。而他的刚强性格和做人的原则,即人生哲学,与一些人不同。又处在那个极左时期,他就必然会落得悲惨的下场。”很复杂的问题,许老概括得多么清楚!

我采访的对象,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从经历上看,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革命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在建国前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革命的献身者,后者是观察者和同路人;在建国后一段时间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豪的主人翁,后者是谦恭的客人和改造的对象。一场共同的厄运促使他们猛省、反思。革命知识分子反思的主题如顾准所说,“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自由知识分子的觉醒是找回失去的自我。心路历程不同,最后却殊途同归。比如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钟沛璋先生反思自己时说:“挨整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正确的吗?不!挨整时,我们有的思想也是很左的。我们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今天走的路。”而自由知识分子出身的萧乾先生,不只一次与我谈到他对知识分子的思考。他说:“若把国家比作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划船手,他还一边划,一边高瞻远瞩,关心船的方向。”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软弱过,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他晚年的反思却越来越有力度。

采访右派,也不尽是采访右派本人。顾准早已去世,但我先后找到他的生前友好吴敬琏、骆耕漠先生回忆与他的交往。骆老早已双目失明,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除了经济学界,一般人都不知道他了。我去他家采访,发现是坐在青年诗人骆一禾的书房里,原

野菊

邢小群·凝望夕阳·自序

来这位早逝的青年诗人，是骆老的小儿子，想起来真是不胜慨叹。

除了采访右派，我还为《华人文化世界》杂志采访过于光远、何泽慧、梁从诫等著名学者，为《百年潮》杂志采访过与宋美龄有过交往的老干部郭健，这次一并将访谈录收入此书。另外，以前写过几篇散文，谈及对几位老作家的印象，也编在其内。

这本集子编好后，当我意识到该为它写点什么的时候，想到的竟是父亲几十年前教给我的一首歌：

醒时的路是沙漠的路，
梦中路也是沙漠的路；
沙漠是我们永远的路，
疲乏而痛苦的旅行之路，
把梦驮在骆驼背上，
迈着沉重的脚步，
在黄昏的地平线上，
走向遥远的路途

.....

这首歌深沉悠远，更令我沉迷的是那苍凉而坚韧的意境。我从来没有听别人唱过，也没有在其他歌曲集里见过。

想想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这首歌给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我的体味，肯定永远也跟不上书中的这些前辈们。这种个人的人生体验与时代的“馈赠”，在他们之前不曾有，之后也不会再有了。

邢小群

1998年9月



邢 小 群 · 凝 望 夕 阳

目 录

[1] 老师谢冕

[5] 你好,梅娘

- [15] 白薇老人
- [19] 小记李英儒
- [21] 思缕中的赵树理
- [26] 唐达成一家
(〔附〕二唐文章的产生经过)
- [41] 冯亦代叙往
- [52] 吴祖光二三事
- [59] 采访邵燕祥
- [68] 萧乾一席谈
- [77] 温济泽洗沉冤
- [93] 曾彦修情结
(〔附〕曾彦修自述)
- [113] 李慎之自述
- [125] 不老钟沛璋
- [134] 朱正与书

[149] 大记者戴煌

[160] 梁从诫的忧思

[170] 刘敦仁的困惑

[180] 于光远漫谈

[188] 郭建的回忆

[198] 袁运生归来谈艺

[207] 何泽慧印象

[211] 仇士华夫妇

[220] 吴敬链谈顾准

[233] 骆耕漠回忆顾准

[238] 重读章乃器

[253] 妈妈

[267] 莫忘李九莲

[270] 与胡平对话

老师谢冕

60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从家里每月收到的《诗刊》里,经常能看到谢冕的名字。当然也仅仅是知道名字而已,因为我不爱看评论,也看不懂。

80年代初,我在外省一所大学中文系教当代文学。第一次开课,就让我讲当代诗歌。我很想到北京大学进修,因为我知道谢冕是著名诗歌评论家,又在北大任教。可是进修的事总也办不通。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冕在北大讲郭小川,讲得师生同唏嘘。我听后颇受撞击。也不知何由,我讲《郭小川的诗歌道路》一章时,很卖力气,对过去回避或曲解的郭小川诗作,没有受当时文学气候的影响,说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学生都说讲得好,有深度。虽然我并不知道谢老师讲了些什么,但好像已从精神上师从了他。

一晃就进入了90年代。那天,我作为访问学者,到谢老师家报到,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有那么多人为你说话?我一听,有些惶惶。心说,真够不客气!是不是我不够格做您的访问学者?但您能被别人说动,说明您还是个有人情味的老师。

再次约见,依然开门见山:你准备了什么课题?我说,我想研究“中国当代小说与性文化”……

“很好!”

我非常惊异。还没等我话音落下,他已作出快捷的反应。原以

为对这个敏感的选题，得费一番解释。也听说，谢老师是研究诗歌出身，可他的弟子中没有有一个专门搞诗歌研究。看来北大的学术空气、治学风范就是不一样。

几天后，我交上提纲。谢老师几眼扫过，说：题目窄了点，应在更大的人文背景中考察中国当代性意识的变迁。并提出，希望我的论文有理论的骨架，视野开阔，有气势，有见解。写论文之前先搞一次专题报告。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叮叮咚咚地打鼓。

“就是让你不轻松。”说完，他笑了。第一次见他笑。我可笑不出来。

谢老师每两周搞一次研讨会。他把这个会命名为“现当代文学热点研究”。其实这是他给博士生、访问学者授课的一种方式。参加的人很多，包括他的已经毕了业的学生和也想执弟子之礼的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研讨会每次有一个中心议题，先由一个学生就热点现象、热点产生的原因背景及个人的分析评判主讲一番，然后其他人参加讨论。那时一场动荡刚过去不久，学术界很沉闷。谢老师却说，我们要珍惜学校仅有的一块清静，不放弃思考，交流信息，出些成果。难怪他以前的硕士、博士生，没毕业时，就纷纷发表文章，而后更是现当代文坛活跃的批评家。他把学生都推上了学术的前沿。他让我做专题报告，就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怎么能不紧张？当然还是硬着头皮干下来了。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谢老师为师的气度。

记得一个博士生做过一个《关于〈围城〉热》的报告。说钱钟书热起来了。有人称他为中国文化的昆仑；外国人认为中国有三宝——长城、故宫、钱钟书；有人说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同学提出，虽说钱钟书保持了20世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但是20世纪造就了钱钟书，也造就了鲁迅。超越历史就没有文学史。那么就鲁迅与钱钟书而言，谁是文学史的主体？从文学史角度观照，他更看重鲁迅的意义。

谢老师听完后说：“你摇撼了一下文学的昆仑。”

谢老师平日总是以参加讨论的角色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学生的观点不多做评价，希望保持一种开放的气氛。有一段时间，他的学生都热衷谈“后现代主义”，挂在嘴上的不是海德格尔、罗兰·巴特就是福科。有的时候他会说：你的发言，有些我懂一部分，有些不懂。这不是谦虚。学生年轻，喜欢追逐新的东西，哪怕有几分食洋不化，但他总是耐心地听，那神色也总是尽可能地理解和容纳。难怪他的学生谈论起来一个个都是那么无拘无束，口若悬河。我觉得一个导师的成就不在于带出多少博士、硕士研究生，而是带出一种学术风范，学人的视野和境界。

我所见到的谢老师，不苟言笑，但他诗人气质，遇事爱激动，发表论见时，感情色彩很浓。比如有一次，说起魏明伦一篇讽刺某名人的杂文，他说：“这是新时期最出色的论文。邵燕祥只是打太极拳，魏明伦是正面出击，让你无法招架还手。×××真有忍耐力，要是我，我就不活了。”

所以，他的情绪、情感型的身教，还给他带来了另一种“尊重”。在他六十岁生日时，他的学生们为他开了一个关于理想主义问题的讨论会。记得他的那个已经毕了业的女博士说：“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讨厌老师。谢老师总让我们不知所措，总拿理想主义这些东西打动我们良心最脆弱的地方。而对我来说，我的理想就是彻底地摆脱老师。老师为理想主义可以不顾一切，而我只能当作青春的回忆。”谢老师先是睁大了眼睛很陌生似地看看她，又看看大家，好像在说，我是这样可恶吗？然后又无可奈何地吸两下鼻子。

谢老师很爱才。依我看真是爱到了纵容的地步。

他自己不抽烟，平日仪表整洁，书案有序，书房经常插着两三朵鲜花。可见他很注意室内空气的洁净。曾听他的弟子说，谢老师是个唯美主义者。可是他竟也容忍弟子们，特别是女弟子们抽烟。那女弟子们一去老师家总喊，“谢老师，烟灰缸！”空气污染，他并无

难色。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弟子外出开会。火车上有人问他：谢老师，对女性抽烟，您怎么看？他说，男人抽烟有失风度，女性抽烟可以增加风度，年轻的女性抽烟，更有魅力。此话也不知是真是假。

他组织学生写研讨文章，那学生们当面都答应得很好，可到交稿的时间，总交不上来。他让我打着他的旗号去催，仍收不回来。他竟有些对不住我似地说：“他们太懒，是吧？太懒。”

谢老师的两个学生生病住院，我都是和谢老师与师母在医院不期而遇。谢老师与人相处，感情并不大外露。一次我和谢老师说起那生病同学的状况，禁不住直流泪；谢老师听着半天没说话，任凭额头的汗往下淌。我察觉他是让眼角的泪渗到汗里面去了。那个生病的同学后来对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支柱，我是我妻子的精神支柱，可我的精神支柱，不是我的父母，而是谢老师。”我知道这同学出此言，并不是因为谢老师夫妇为他的住院医治奔波，为他的调养，组织同学们给他熬汤喝，而真是出于对老师人格的敬重和情感依恋。

(1996年)